

## 進入城市之後 ——讀王笛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（修訂本）》

劉芝慶

曾出版《街頭文化：成都公共空間、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，1870–1930》（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: Public Space, Urban Commoners, and Local Politics, 1870–1930*）、《茶館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，1900–1950》（*The Teahouse: Small Business, Everyday Culture,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, 1900–1950*）、《中國記事 1912–1928》、《歷史的微聲》等中英文重要著作的知名學者王笛教授，對於新文化史、微觀史浸淫已久，歷有年所。他在 2024 年重新出版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（簡稱《走進》），說是“重新”，也不完全正確，如〈後記〉所言，《走進》最初在 2013 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，2018 年進行了比較大的修訂，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二版。這次又在第二版的基礎上作了大修訂，例如增加第一編（四篇文章）、刪去了原有第四編“社會主義城市與國家”、更改書名、註解另又附以〈徵引資料目錄〉等等，才有了如今的面貌。<sup>①</sup>

王笛早期的著作《跨出封閉的世界：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（1644–1911）》，並非以微觀著稱，歷經研究方向轉折，從精英到民眾，逐漸走向“顯微鏡”與“微聲”的方向，他自言“這樣一個轉變就是方法上的、史學觀的、史學理論的轉變”。<sup>②</sup>而《走進》，正是王笛金針度人，既是學術方法的示範，也是學思歷程的呈現，所謂的“走進中國城市內部”，其目的正是希望讓讀者對於相關理路與研究，能知其然，亦要知其所以然。

### 一、走進城市內部

本書除〈導言〉與〈結論〉、〈後記〉之外，共分五編。第一編“書寫城市的日常史詩”，主要由兩篇採訪與兩次演講改寫，分別是：第一章〈怎樣進入中國城市內部？〉、第二章〈進入茶館後，我們能看到甚麼？〉、第三章〈現代中國的城市管理〉、第四章〈城市歷史寫作，怎樣面向大眾？〉。不論是西方的史詩，還是孟繁《本事詩》以來的詩史，兩者固然定義有別，相同處卻都特指宏大的、重要的政治或是文化事件。所謂的日常史詩，正是他一直

---

**作者簡介：**劉芝慶，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，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，台灣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院博士後，現為湖北經濟學院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研究中心教授。此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《東亞儒學的現代話語體系建構研究》（項目編號：24YJA720008）的階段性研究成果。編者的修飾讓書評更加完善，謹此致謝。

<sup>①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 年，頁 338–40。

<sup>②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 年，頁 13。

以來關切的微觀史、城市史、大眾生活的另種表達。他提出幾點反思，首先，宏觀與微觀能否結合？當然，後者是基礎，“以小見小”當然很好，“以小見大”更是高明。<sup>①</sup>第二，日常資料又在哪兒？他以自己的研究為例，諸如報紙、檔案館材料、日記，甚至實地考察等等，都屬其內。第三，進入城市內部，如茶館等空間之後，又能看到甚麼？王笛說“吃講茶”、藝人表演、打麻將，這些行為既是日常的，也牽涉到了官方，例如因為藉由“茶”而來的“講理”，此類的基層調解常導致司法權分化；<sup>②</sup>也可以看到包括藝人在內的表演者，或是娛樂活動面臨社會主義的改造，“官方”對於“民眾”的調查、分類，甚至針對各種大眾娛樂的調查與考核；<sup>③</sup>此外，在茶館打麻將，看似日常性的回歸，同樣也面臨了官／民的牽扯，對於政府而言，因應民眾娛樂需求，既有穩定社會的作用，但也要注意城市形象，以及輿論的批評。<sup>④</sup>第四，呼應以小見大，王笛認為城市／區域研究也應該與全球史對話。<sup>⑤</sup>以上數點既牽涉到學術問題，也與當代社會息息相關。以研究方法來說，都市歷史寫作，如何面向大眾？注重“文學性”是作者的答案，沒有統一的研究範式，更有利於學術研究。作者也着重探討了兩種研究視角：“國家敘事”與“日常敘事”。他認為兩者有時相反卻也相成，在以日常為基礎的視野上，應思考如何將“國”融入，不離不雜，不要非黑即白，但也不能魚目混珠。<sup>⑥</sup>就社會生活來看，現代中國的城市管理，作者認為政府的力量過大，非但不符合中國社會自主性的傳統，也會影響公共領域的建立。政府要懂得分擔和分散責任，才能讓社會運轉得更好。<sup>⑦</sup>

第二編“新城市史的視野與方法”，收有第五章〈從宏觀到微觀史的城市史〉和第六章〈文學、圖像與歷史的真實〉。王笛指出中國城市史、近代史研究一直存在輕重不分的問題：重沿海、輕內地，重政治、輕日常，重精英、輕下層，重鄉村、輕城市，重宏觀、輕微觀，重變化、輕持續，重相異、輕相同。所謂的“輕”與“重”，並非是研究對象的差異，而是一種史觀與價值觀、一種研究態度，代表着不足與忽視。作者以自身學思歷程為開題，講述了研究方向經歷了從精英到下層，從宏大敘事到日常取向的轉變。<sup>⑧</sup>若以《跨出封閉的世界》對照《街頭文化》、《茶館》，可以發現後面的兩本著作正是王笛從微觀史的角度，進入原本所“輕”的事物，並提煉出幾個重點：一是國家文化如何影響地方文化；二是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，怎麼抵抗國家文化的滲透與主宰；三是兩者如何互動拉鋸。王笛認為“微觀研究的意義在於，能夠把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廣義層次而提供個案分析，其不僅能豐富我們的地方知識，而且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理解”。<sup>⑨</sup>

<sup>①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14。

<sup>②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7。

<sup>③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9。

<sup>④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30。

<sup>⑤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3。

<sup>⑥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58。

<sup>⑦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45。

<sup>⑧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61。

<sup>⑨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82。

第三編“新文化史的理論”，包括第七章〈大眾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〉、第八章〈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的啟發〉。新文化史大概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，與後現代思潮約略同時。新文化史重視邊緣文化，聚焦普通人，行文多採敘事，強調文本與語境的關係。雖然諸如大事件的“大”，仍是新文化史家的研究重心，但他們也不棄“小”，更開發出許多新課題：日常生活、性別、身體、形象、記憶等等。<sup>①</sup>其中，大眾文化更是他們研究的主要對象，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，固有分野，若要精準界定，恐有困難，事實上也無須糾結在此，兩者既有同一性，當然也有獨立性，時而交錯，或隱或顯。<sup>②</sup>王笛以“象徵系統”、“大眾宗教與民眾運動”、“城市大眾政治文化”、“算命與巫術”、“國家權力”來說明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同一性與獨立性。至於時間與空間，一向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範疇，到了新文化史家手上，更能深化與多元化，例如時間觀念的演變與生活方式、歷史記憶的塑造流傳等等的研究課題，“可以幫助理解人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會和時代變遷的軌跡”。<sup>③</sup>所以，王笛把茶館視為微觀世界，考察以小商業經營方式的茶館、茶館對人們日常生活的作用，以及茶館在公共政治的角色，正是深受新文化史理路的啟發。

第四編“新城市史研究路徑與概念”，收有第九章〈中國城市的政治、組織和階級〉、第十章〈城市文化與公共空間研究的關鍵詞〉。當新文化史興起後，近代中國城市研究似成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之顯學。羅威廉（William T. Rowe）、史謙德（David Strand）、顧德曼（Bryna Goodman）、韓起瀾（Emily Honig）、裴宜理（Elizabeth J. Perry）等人，不論是研究社會共同體與城市政治，還是群體與性別、城市與烏托邦想像、工人階級等等，都有佳作。相較於此前費正清（John King Fairbank）提出的衝擊／反應模式，如今研究更注重中國內部因素。其實，拆了門檻便無內外，內外固然有分，但是光注重某部分顯然都是不足的，“近代中國社會的演化當然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”。<sup>④</sup>至於城市與公共空間研究，幾個關鍵詞尤值得注意，首先，“國家”究竟是 country、nation 還是 state？無關對錯，而是研究者在使用上需有高度自覺，王笛的關注點在 state，故其所說國家常與“政府”有關，“政府”又具有相對性，政府相對於人民，地方政府、軍閥政府又相對於中央政府。再者，“公共生活”往往被研究者忽視，《街頭文化》其實是對這類研究課題的開拓，也是對“公共領域”的修正。<sup>⑤</sup>而“街頭文化”、“民眾”與“社會改良者”，三者多有複雜關係，影響着地方政治運動。社會改良者或可分為兩類，一是握有政治權力，如周善培；二是沒有在官方任職，但在商業傳媒教育等等有影響力，如傅崇矩。這些改良精英與大眾文化的同一與分裂，常常並存，隨着政治、經濟等等，多有變化。

第五編“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”，則有第十一章〈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〉、第十二章〈公共空間、公共領域、民間社會〉。關於“公共領域”（public sphere）適不適用於中國

<sup>①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168。

<sup>②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146。

<sup>③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176。

<sup>④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14。

<sup>⑤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21。

歷史，與社倉、善堂、育嬰堂、普濟堂、清節堂，能否類比或援用，羅威廉、魏斐德（Frederic Wakeman）、史謙德、黃宗智等，贊成與批判，言人人殊。王笛指出，這些研究者自覺使用“公共領域”，並刻意突出與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的不同，“公共領域”非“市民社會”（civil society），所以重點不在於能否使用，而是怎麼定義這個概念。<sup>①</sup>西方的公共領域，諸如咖啡館、酒吧、廣場等空間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擴張，也成了政治活動和公眾輿論的萌發地。<sup>②</sup>反觀成都的茶館，多有異同，例如提供娛樂活動、生活所需，甚至包括了性別歧視等等，中西皆是，多有相似；但是成都茶館的桌子是公共的，可以“拼桌”，鄰桌也可以隨時加入談話或活動，這點就與巴黎餐館（空間是公共的，桌子卻是私隱的）頗有差別，這也是公私關係之異。<sup>③</sup>至於茶館之後，當今的公共空間又何在？“互聯網可能是一個答案。”<sup>④</sup>王笛認為互聯網是一個虛擬的空間，但已漸成公共空間，也是民眾表達意見的新方式。

## 二、進入城市之後

王笛的研究深受“新文化史”與“微觀史”的影響，關注那些常被忽略的“普通人”與“小聲音”。他以街頭、茶館為切入點，從視覺、聽覺與觸覺等細部感知出發，觀察日常運作，看似瑣碎的細節，實則牽連着城市的公共世界，也折射出政治與生活之間的張力。就書寫策略來說，《走進》兼具考證與敘事的文風，並引入跨學科的視角，王笛又擅長處理艱深的材料，轉化為節奏明快、條理清晰的論述。他的文章風格，既有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，又自鑄偉辭，別開生面，成一家之言，有嚴謹的學術性，也顧及閱讀的節奏感，使文字充滿厚度、富有餘韻。《走進》雖非自傳，卻頗有“讀史閱世數十年”的風格，閱讀即對話，研究即感受，既是學術的，也是當下的，是研究過去，也關心未來。書中一針見血的評論隨處可見：“這種對未來有預期的和平生活，才是日常，是值得特別珍視的。這難道不是我們普通人最宏大的敘事嗎？”<sup>⑤</sup>“中國人太多，地域太大，所以事情難辦。但是他們似乎不懂得，一切靠政府，事情焉有不難辦之理。”<sup>⑥</sup>“中國社會和公共領域不發達，政府要負責。”<sup>⑦</sup>“當我們這個社會能夠容忍歷史學家脫離現實地研究歷史問題，我們才能真正對一些歷史問題作出深刻的認識。”<sup>⑧</sup>“現代化也應該容忍一部分人維持自己喜歡的生活節奏。”<sup>⑨</sup>所在多有，不能盡舉。

<sup>①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61。

<sup>②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64。

<sup>③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78。

<sup>④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93。

<sup>⑤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33。

<sup>⑥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42。

<sup>⑦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45。

<sup>⑧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85。

<sup>⑨</sup>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103。

另外，關於術語概念的問題，王笛的觀點值得重視。關於中西理論的援引，討論也極多，並牽涉到近代以來學術霸權的問題。學界（特別是中文學界）對於這種現象，頗有憂慮，拋卻自家無盡藏，林安梧稱為“逆格義”，劉笑敢稱為“反向格義”。<sup>①</sup>可是，換個角度，錢鍾書在《談藝錄》說：“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學北學，道術未裂。”<sup>②</sup>在不同文化中找出共有、共用，尋覓互通，深化論述的力量，顯然也是跨文化的重點。可惜正如葛兆光所說，所謂的國際化，總是我們化過去，他們不化過來。<sup>③</sup>不過就如王笛所言，以公共生活來說，中西區別並非如此巨大，當強調中西相異的研究，已汗牛充棟之時，“我們也應該仔細考察它們的相似之處”。<sup>④</sup>作者更是敏銳地指出，當我們批判西方學者，總愛用西方概念解釋中國歷史，這種說法可能正確，卻無甚意義，因為西方史學本就以西方概念為基礎，問題不在於適不適用，而是他們是否將西方價值觀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。<sup>⑤</sup>

### 三、身處城市之時

然而，《走進》的有些觀點值得再論，像是王笛認為司馬富（Richard J. Smith）研究算命，可以挖掘中國社會宗教等意涵，但又指出司馬富說相信算命與科學發展無關，並質疑這是過於簡單化的解釋。王笛認為近代中國在科學知識普及的同時算命衰弱，以及現代比古代相信算命的人大量減少。<sup>⑥</sup>這種論述恐怕流於直覺，不一定可靠。事實上在不少人的“感覺”中，相信算命的人並未減少，可能更多，而對“算命”的解釋與定義，因為知識普及的關係，更多的是與心理學、未來學、生死學、環境史（例如風水）等結合。至於前引“一切靠政府，事情焉有不難辦之理”，<sup>⑦</sup>所謂的難不難辦，還不只是政府擴權的問題。從杜威（John Dewey）所謂的“志願結社”（voluntary associations）<sup>⑧</sup>，到王效禹（Barbara Xiaoyu Wang）用“關係資本主義結構”（guanxi capitalism structure）研究中國跨國企業的外派人員，<sup>⑨</sup>都反映出中國社會特別注重人情、人際與人脈，各種關係糾葛叢生，以至於

<sup>①</sup> 李貴生：〈論胡適對自然主義的挪用：兼論“反向格義”的源起與迷思〉，《文與哲》（高雄），第37期，2020年，頁231-32。

<sup>②</sup> 錢鍾書：《談藝錄》，台北：書林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1。

<sup>③</sup> 葛兆光：《域外中國學十論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頁10。

<sup>④</sup> 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85。

<sup>⑤</sup> 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263。

<sup>⑥</sup> 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155-56。

<sup>⑦</sup> 王笛：《走進中國城市內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4年，頁42。

<sup>⑧</sup> Dewey, John. "Federalism in China." *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, 1899-1924*,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, vol.13,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, 2008, p. 152. 作者在《走進》第270頁中，引用了 Powers, Madelon. *Faces along the Bar: Lore and Order in the Workingman's Saloon, 1870-1920*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8，其中也有“voluntary associations”一詞，用意是指這些酒吧俱樂部的彼此成員，比其他組織更為密切。但杜威則是說民國以來，皇權不再，已無法管理這個土地遼闊卻交通不便、三四億人口、眾多語言、注重家族制度與祖先崇拜所產生的地方的觀念，而中國的社會基礎，是由習俗所造成的地方結社的網絡關係。

<sup>⑨</sup> Wang, Barbara Xiaoyu. *Guanxi in the Western Context: Intra-Firm Group Dynamics and Expatriate Adjustment*. Palgrave Pivot, 2019. 不過，這種關係主義就作者看來，優點可能多於缺點。此外，作者畢竟非文史專業，她認為原因是儒學所致，作者此說恐流於武斷。畢竟，到底是儒學導致了重視關係，還是重視關係產生了儒學，尚可再論。

公私不分，官民皆有，喜歡從權宜、協商的角度，補充規則，看似充滿彈性的人情世故，卻也容易讓制度流於形式。從民間做生意到學界發文章，再到政府的各種行政手續等等，幾乎都可發現這種現象，所以事情更難辦（當然，反過來說，“有些人”可能會更好辦事），故所謂的擴權，究竟是行政權力的延伸，還是階級與人際之間權力運用，還未可知。或許這也是研究微觀、日常生活、社會自主性的重要切入點。

此外，精英與大眾同在公共空間（如茶館、公園）等等，是否會有差異呢？例如“公園”對於胡適而言，是“談公事”的地方，這與大眾所重的休憩功能，似有所差異；而民眾對於公共空間，也常有破壞性，例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初建的漢口紫陽書院，由徽州同鄉集資創辦，兼具會館功能，陸續擴建，卻屢遭當地人破壞，甚至侵占，董桂敷就說：“亦謂我書院初基，經緯未定，群言遞起，竭力以潰于成，中更因循，產契潛佚。”<sup>①</sup>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畢沅再任湖廣總督，支持書院，還特地貼出告示，說書院準備修葺，如有刻意尋釁滋事，又或攫竊財物，搔擾妨礙者，一律依法處理：

示仰該處保甲軍民人等知悉，如敢乘此興工之際，攫竊木料磚石，及藉端尋釁滋擾，許該商等指名赴地方官具報，以憑嚴拿究辦，不稍寬貸，各宜凜遵毋違。<sup>②</sup>

可見公共空間與民眾、公權力之間，關係錯綜複雜，不只是地方與國家有抵抗滲透的關係，地方之間的民眾也不是和諧的。

最後，《走進》不僅是城市史的成果，也是進入中國社會複雜結構的鑰匙。它適合關心城市化進程的史學、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者，也適合思考“公共領域”與“民間社會”議題的文化評論者閱讀。對相關領域研究方法感興趣的讀者，能從中看到微觀史的可能性；而對一般讀者而言，本書則提供一種理解城市日常與公共生活的視角，使人意識到歷史並非遙遠的想像，而是由無數平凡人共同編織的當下。王笛筆下的城市，不只是研究對象，更是一種理解中國社會的方式。

<sup>①</sup>董桂敷：《漢口紫陽書院志略》，武漢：武漢出版社，2019年，頁2。

<sup>②</sup>董桂敷：《漢口紫陽書院志略》，武漢：武漢出版社，2019年，頁284。